

# 模仿“网红”短视频,要这流量有何用

玉渊杂谭

张盖伦

你完全能从短视频平台上风格各异视频中得到“快乐”。

比如有人给自己的孩子挖坑,拿透明胶带设置障碍;有人在地铁上撩“小姐姐”,惹来路人的诧异眼神……这些“有毒”的视频,15秒一段,填满你的业余时间。

算法一旦发现你的喜好,就会执着地向你推荐同一类视频,于是你看了十个不同的“小姐姐”,又见识了二十种贴胶带的方式。强大的推荐系统,一下一下踩中你的兴奋点,然后这一切又形成正反馈,你的大脑叫嚣着想要更多。

那些被打上同样标签的、由不同人拍摄的视频,通过算法,分发给那些钟爱于此的用户。于是,有了各种模仿。

有的是为好玩,而有的,是为了“红”。

但最近,你也听到了各种版本的荒唐新闻。

有人在饭店里跟陌生食客玩“以菜换肉”的抖音经典桥段,引发围观大战;有人为了拍“拿车标当盘子”的趣味视频,在街边狂奔车标,面临刑事指控;还有悲伤的案例,爸爸抓住女儿向上翻转180度时失手,孩子头部着地,脊髓严重受损。

这些模仿者,是短视频流量帝国中的迷失者。没错,短视频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但这流量并非平均地分配给了每一个人。“大号”“红人”收割了大部分注意力,草根们也并不甘心就这么成为平台的看客。他们心里期待着“一夜成名”的神话。

短视频的规则残酷而清晰。看得人越多,点的赞越多,被推荐的机会就越大;如果你摸不准平台的调性,那模仿已成为热门的视频,显然成功几率更大。

现在短视频平台设置了风险提示,比如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可是,作为成年人的模仿者,真的不知道危险吗?

放在平时,偷车标不蠢?抛孩子蠢不蠢?在大街上随便找陌生人搭讪蠢不蠢?但来到短视频平台,你就得适应它的玩法;就算你知道蠢,你也要放手一搏。你得到“赞”,你获得关注,有人评论你“6666”;你觉得一切都有了意义,人生在这些面目模糊网友的追捧中有了价值,你发现自己被需要,你发现自己在流量时代也能发声。

流量时代,流量等于价值,吸粉能力就是王道。娱乐圈中,流量绑架制片方,于是电视电影业“苦肉难小鲜肉久矣”。但流量何尝没有绑架渴望成功的素人?

这里的“成功”,未必就是要赚得盆满钵满,当下一个Papi酱。被算法推荐是成功,被更多人看到是成功,有人夸赞,也是成功。如何博眼球是一门学问,但普通人很难做到姿势优雅。素人跃跃欲试,想得到流量青睐,但这条路太难走,一不小心,就把自己送上社会新闻头条,或成为悲剧主角。

是的,短视频平台有责任,它要对试图模仿者进行必要的风险告知。但轰轰烈烈的跟风模仿,也许正是流量时代的产物。人们甘愿被流量绑架,博一个“赞”,或者博一个远大前程。

# “黑石头”的爱与恨

字里行间

高博

1306年夏天,全英国的主教和贵族去伦敦开国会,一进城,就被煤烟熏得心烦意乱。很快,他们为此事向国王示威。

在美国人巴巴拉·弗里兹的《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里,描述了煤怎样困扰英国人。中国人对此心有戚戚。其实靠煤发家的英国人,吃煤炭的苦头,只比中国人更多。

马可波罗访华,惊讶于中国人用煤,他不知道那时英国人也烧煤。1257年,埃莉诺王后访问诺丁汉时,就被煤烟的气味给熏走了。诺丁汉人烧煤制石灰,好修城堡。

1306年贵族们闻到煤烟味儿,因为这种黑乎乎的石块已广受工匠的青睐。贵族们反对使用新燃料。国王随即下令禁煤,初犯者罚款,再犯毁炉。但禁不住。

当时没人会在家烧煤。因为煤质量不高,烟大。家里柴炉烧煤,煤烟会充斥每个角落。黑死病期间,人们相信乌黑的煤烟代表危险。有一位作家写:“死亡正像黑色的烟雾一样逼近我们。”人们闻见煤烟有硫磺味儿,让他们相信煤和地狱有联系。

后来,烟囱和壁炉改良了,煤烟顺利地排到屋外去了。这么一来,公共空间倒了霉。1578年有消息说,伊丽莎白一世对煤烟的味道无比伤心和苦恼。

当时人写道:煤烟渗入每一个房间,悄悄溜进壁橱和储藏室,在每件东西上留下黑色的肮脏微粒。家具,被褥,壁挂都被污染。这让当时的富人灰头土脸。还有人描写:阳光很难穿透煤烟,旅行者几公里外还看不见伦敦,倒是先闻见了煤烟味。

伦敦一下雨,落到地上就成了一个个黑点,所以18世纪的伦敦人都喜欢撑黑伞。伦敦的街道铺上一层黑地毯,烟尘导致咳嗽和中风。这些煤灰一股脑流进泰晤士河,给游泳的人罩上了一件黑色外衣。

植物也倒了霉。1661年有人说:许多花都从伦敦绝迹。生长在伦敦的倒莓水果,有一种苦涩、

令人不快的味道,而且不能完全成熟。

有人说:伦敦的痰越来越黑!教堂里时时有诅咒声,吐吐沫。音乐界的朋友从乡下来到伦敦,纷纷抱怨音域不那么宽广了。游客们来到伦敦,常出现种种身体不适,一离开伦敦,症状马上消失。当时人们不懂病原体,相信煤烟是多种疾病的元凶。

煤炭讨厌,采煤的人更讨厌。17世纪早期法院的案件记录里,居民指责矿工是下流胚子,是各郡县的渣滓、糟粕。总之,中世纪的农民和工匠,无论多穷,也没有像17世纪的煤矿工一样被邻居们疏远。久而久之,这些被孤立的矿工形成了与别地不同的习惯和口音。他们实质上是工业时代的农奴。

矿工是最危险的工作。比如说他们面临好几种致命毒气。

一种叫窒息气,大概是二氧化碳。有的小组闯入窒息气较浓的区域,全都跪地而死,像是中了枪;有个矿工来不及叫喊,说了声“天哪”就死了。

一种叫白色湿气,大概是一氧化碳。有报道说:“这种芬芳的香味在矿井中散发开来,像紫罗兰,又像甜甜的花香。当一名矿工贪婪的呼吸,这阵猛烈的芳香使他突然倒地身亡。”为了应付这种毒气,矿工们使用金丝雀、老鼠和狗打前站。

还有一种爆炸气,就是瓦斯,或者说甲烷。它渗出煤层,有时嘶嘶地迅速泄漏,它们堆积在矿井的顶部,如果只有一小块爆炸气,遇到火,人可能会被击倒、烧焦。如果爆炸气体积很大,那就糟糕了。比如有一次,一次大型爆炸发出震天的声响,像最暴烈的雷,所到之处,矿工、马、车和工具都被狂烈的撞碎、撕裂,与垃圾和木材埋在一起。有时爆炸过于厉害,牺牲者会被抛到离井口相当远的地方,就像子弹飞出枪膛。

当然,不用说最危险的水灾了——这也导致了蒸汽机的发明。

巴巴拉·弗里兹不是大学教授,而是一位关心环保的律师。《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提到欧洲用煤的起源、煤矿开采的进步、火车的普及和煤的社会效应。书不厚,要言不烦,值得读一读。



印象 东喜马拉雅(丙烯画) 李诗华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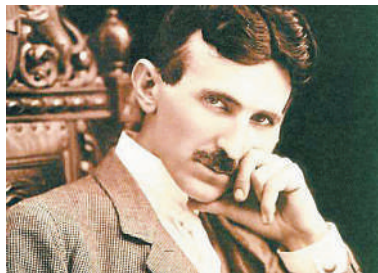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于网络“画框里的科学——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画展”

# 游特斯拉博物馆 致敬被遗忘的天才

行者无疆

杨雪

拜访贝尔格莱德的特斯拉博物馆之前,我并不知道尼古拉·特斯拉先生的骨灰就安放在此。眼前,一根四方立柱托着一个黄铜色的金属球,一束黄色灯光打在球面上,微微照亮后墙的整面镜子。深吸一口气,此刻,我与这位“最接近神的男人”距离不足一米。



说起伟大的发明家,多想到爱迪生。而说起特斯拉,多首先想到电动汽车——这命名其实是马斯克对偶像特斯拉的致敬。正如特斯拉其人“被世界遗忘”一般,这座纪念他的博物馆也低调得可以。据说,这幢二层小楼是特斯拉生前在塞尔维亚的房子,里面陈列的私人物品是任子在他去世后,通过努力从美国取回的。博物馆建于1952年,5年后才迎回主人的骨灰。展区很暗,很小,布展很紧凑,“压缩”了特斯拉一生带给世界的巨大能量。

一进门,我们就被邀请参加实验——站在一个高过头顶的“特斯拉线圈”周围,每人从导览员手中领一根没有连电线的灯管,双手握住。导览员打开装置开关,线圈顶部产生的电流一次次打击屋顶顶部的金属球,咄咄作响有点吓人。几个回合之后,大家手中的灯管相继被点亮。走近特斯拉,从感受无限能量传输(即无线电)的奇妙旅程开始,尽管世人对他的记忆更多与交流电有关。

特斯拉博物馆馆藏约有16万件原始文献和约5700件其他物品。能参观的不过一楼的三个房间,第一间播放特斯拉生平介绍的纪录片;第二间像实验室,摆放了十几种特斯拉发明的实验装置,有些可供游客体验;第三间像生活区,展示了特斯拉的衣帽、皮包皮鞋、钢笔怀表等遗物,骨灰安放在一隅。从“实验室”通往“生活区”的过道墙上,挂着各种推演公式和电路图。

我在观影区左手边的尼亚加拉水电站模型前驻足良久。几年前去美国旅游,第一站便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却没留意到瀑布公园里有座特斯拉雕像。1897年,当世界各地都使用着昂贵的直流电时,尼亚加拉水电站采用特斯拉的交流电发电机和输电技术,解决了35公里外的水牛城供电问题——由于电路上的损耗,如果采用直流输电,每公里都得建一套发电机组,这样是无法建成尼亚加拉水电站的。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尼亚加拉水电站依然工作如常。而我们,生来已享受着交流电带来的便利、便宜的用电环境,鲜有想过这一切其实并不理所当然。

特斯拉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天然会被落后生产力排挤,注定他一生屡受打击。著名的交流电直流电大战只是冰山一角。在那个时代,即便非利益相关方,也鲜有理解特斯拉的人。他曾兴奋地跟老朋友谈起,他发明的涡轮机将淘汰世界上所有的热力学发电机,得到的却是一句“那会出现如山的废料”和老友的转身离开。

对于“天才都是孤独的”这句话,我第一次从特斯拉身上有了直观的理解。他十岁进入一所新建的实科中学,深深被电学和机械仪器吸引,唤起他身体里强烈的发明欲望;第二年,他探索机械飞行,拿着雨伞从屋顶跳下,重重地摔在地上……回忆录里说,他的大脑可以自由切换公式和图像,他的听力敏感度是常人的13倍,一辆马车从几英里外驶过,会让他整个身体颤抖好一阵……这些天赋异禀,让我有些怀疑回忆的真实性。

站在特斯拉博物馆出口,我拿出手机发朋友圈,心潮澎湃地写下“他是二十世纪的缔造者”。现在想想不够准确,二十世纪原本就有,他所缔造的应是人类二十世纪的生活。而对于自己的发明,特斯拉有更深远的思考,他并不认为它们一定可以引发商业和工业革命,而是可以让人类在诸多方面获得新的成就,纯粹的应用价值与较高层次的文明进步相比次要得多。

特斯拉同时也看到,这种进步也充斥危险和障碍,比物质匮乏和贫穷引发的问题还要严重——“如果我们能够将原子的能量释放出来,或者在地球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开发成本更加低廉而规模没有限制的能量,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反而可能引发冲突和混乱,为人类带来灾难,最终导致反对力量登上统治地位。”在这位“先知”去世两年后,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其实,除了生于塞族家庭,特斯拉生平跟塞尔维亚没什么交集。他在克罗地亚出生,在奥地利、捷克求学,在匈牙利、法国工作过,在美国走向事业巅峰。他的整本回忆录里,貌似只提到过一次塞尔维亚,就是他童年曾迷上刻图,因为受塞尔维亚爱国诗歌影响而钦佩主人公高超的武艺。世人“遗忘”了特斯拉,塞尔维亚人要纪念自己的“民族英雄”。他们把特斯拉的头像印在了面值100的第纳尔上,旁边还有那个著名的磁感应强度公式:  $T = Wb/m^2$ 。



杨雪摄

# 一百年前,他这样定义科学精神

胡一峰

梁启超是近代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国学大师。今天说起梁启超,大家都知道他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卓越建树。不过,梁启超关心科学的热忱并不亚于人文社会科学。虽然他谦虚地说自己对于“科学完全门外汉”,但他不仅关注着当时世界科学的进展,而且对科学精神有过十分精当的论述。

1922年,他发表了名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他说:“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在梁启超看来,科

学精神首先是求真知识,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如此彻底搞清楚一事物之本质。其次要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好像拿许多结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涵盖到这一组知识的全部”,也就是建立起系统的知识体系。最后,这种系统的真知识以及求知的方法应可以传承,“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发明”。他提出,科学精神有几个大敌。首先是笼统,爱说些大而无边不着边际的所谓道理。其次是武断,轻率地违反真理甚至不符合常识的判断。再次是虚伪,隐匿真证,杜撰假证,貌似深秘,实则欺骗世人。复次是因袭,一味信从古人,不能应时代需求去开拓。最后是散失,学问无法传统。

在梁启超看来,科学精神并非只适用于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而适用于一切治学求知的事业。梁启超本人就把对科学精神的理解运用到人文社科研究之中。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皆可视为科学精神治学之典范。梁启超还强调治学要摒弃功利目的,以求得真学问为最高目标。在他心中,沐浴在科学精神下的学问人生,是充满快乐的。也是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自己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分析‘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所谓“趣味主义”实际上是倡导人们发现治学本身的意义,摒弃功利的目的。显然,趣味主义和科学精神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举凡科学史上有真成就、大成就者,无不是那些在探索自然奥秘中自得其乐的人。

梁启超说的这些话,离今天已经快100年了,但依然值得咀嚼品味。今天,我国的科研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了完成科研项目而做实验,写论文,只追求论文数量不讲质量,都与缺少科学精神、趣味枯竭有莫大的关系。而在社会舆论场中跑得比事实还快的伪科学、真谣言,又映射出梁启超批评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等文化病症。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还把科学精神融入对子女的教育之中。梁启超一生共养育了九个子女,个个成为行业翘楚,还

出了三个院士。翻译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家书,经常能读到语重心长的“科学教育”。1927年4月27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专业的梁思永的信中提到,瑞典学者要组团去新疆考古,梁启超自掏腰包给梁思永争取了个名额。他说:“我想你回去,能否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冒险之类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有大益的,所以我不肯把机会放过。”

这一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留学的梁思庄面临选专业。梁启超以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洞察力,预见到了生物学的发展前景。而在当时的中国,现代生物学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梁启超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我想你们兄弟姊妹,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的事……我很想你们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先进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好不好?”虽然最终梁思庄没有以生物学为专业,而是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图书馆专家,但从梁启超的信中也可以体会他“科学传家”的愿望。梁思庄是梁启超的子女中唯一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这可谓弥补了梁启超的遗憾。可惜梁思礼5岁时,梁启超就去世了,不然,或许还会留下更多科学范儿满满的家书。

梁启超之死已是近代医学史上一段公案。按有的记载,他死于一场医疗事故,医生在手术中切错了肾。事故发生后,面对因此而起的批评西医的舆论,梁启超说,西医是科学的,不能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个案,全盘否定西医。时至今日,不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我们都已经有了更加全面、辩证的看法。但细读这段历史,却可体会到梁启超与其说是西医的拥趸,不如说是科学精神的护法。在他心中,有一种充沛的“科学自信”。这是一种对科学精神的信念,它不是崇拜某些知识或哪一条定律,而是秉承探索未知、务实求真的精神。对这种信念和精神,梁启超之所以不惜以身捍之,乃至看淡生死,还在于他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结尾所说,我祝福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敢再想想,这也正是新时代条件下我们继续弘扬科学精神的原因之一吧。



图1 梁启超家书 图2 梁启超像 图3 梁启超故居

